

明
清
小
說
研
究

第1輯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336

明 清 小 说 研 究 (第一辑)

中 国 文 联 出 版 公 司 出 版

(北京建国门泡子河10号)

新 华 书 店 北京 发 行 所 发 行

七 二 一 四 工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28千字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江苏第1次印刷

印数：1—5400册

统一书号：10355·245 定价：1.90元

开 卷 语

夫千古以来，为文章，无定法，尤以小说为然。我国文化悠久，小说渊源远甚。溯自上古神话，中经志怪述异、传奇话本，乃有明清两代小说之盛。自施耐庵、罗贯中两大师以《水浒》、《三国》二书问世，各以数十万言之鸿篇巨制，醒世惊目，奠现实主义小说之基础，立长篇说部之楷范，使我国文学顿入全新阶段。其后名家辈出，《西游》、《金瓶》、《儒林》、《聊斋》与《红楼》诸作，各各独辟蹊径，翻新创作，决不蹈前人窠臼。其间等而下之之作，又何止千数百部！与此同时，绘画与戏曲两门，亦相应高度发展，形成百花争艳局面。言必称希腊者，每闻西方有所谓文艺复兴时期，即为之倾倒，其实我明清两代艺作，又何尝让之？自卑心理，早该涤荡。数典忘祖，原因固多，与夫倡导不力、研讨不精，亦不无关系，此乃《明清小说研究》兴办之所由也。本所同志，才疏学浅，窃思上林丰饶，不辞茵茵草地；大海汪洋，不择涓涓细流。著参虽贵，不鄙荆芥之贱；绿叶臻茂，方衬妖娆之美；此又我辈之所以敢于一试也。

本书将兼容各种观点，贯彻双百方针。篇不计长短，文不论家门。考证务以翔实见长，论述当以深颖取胜。论难不避，言当有据；评说当新，力戒浮华。要之，小说之产生发

展，因素至繁。内涵既广，外延尤纷。造作者思接千载，虑及万物，不法之法，虽云变化不尽，而高山探宝，终必有径迹可寻。迩来改革浪潮，遍于全国，百业同胞，意气风发，振兴中华，争相献力。我明清小说研究界又何敢懈哉？！无为古而古之心，有以古促今之意；无藏外守旧之念，有敝帚自珍之乐。切磋自勉，古训常存。期以三年，必有瓜豆之收，幸我海内同好察焉。

明清小说研究 第一辑

目 录

开卷语

· “开创明清小说研究新局面”笔谈 ·

- 明清小说研究途径的随想 何满子(1)
从《明清小说研究》所想起的 吴调公(6)
从“新”处着眼，向“深”处掘进 陈辽(13)

· 综 论 ·

- 中国古典小说的典型群 萧兵(19)

· 《水浒》和施耐庵研究 ·

- 《京本忠义传》考释 李騤(48)
东京所见两部《水浒传》 范宁(71)
施耐庵生平探考散记 刘冬(74)
施耐庵“元朝辛未科进士”试证 陈建华(100)
三千芥子多做了藏愁孔
——《耐庵遗曲》赏析 王同书(110)

《施耐庵研究》出版..... 仁 (70)

·《西游记》和吴承恩研究·

巫术·神话·宗教

——《西游记》中所反映的宗教观念..... 姚政(123)

以奇取胜 师心独见

——论《西游记》的传奇性..... 吴圣昔(140)

《西游记》的原本及其改作

.....[日本]小川环树作 胡天民译(157)

吴承恩胸像的科学复原..... 张建军(183)

《西游记研究》出版..... 华(156)

·文言笔记研究·

略论《庚巳编》..... 罗德荣(188)

·《金瓶梅》研究·

《金瓶梅词话》故事编年..... 朱一玄(197)

·《儒林外史》研究·

《儒林外史》第五十六回当属原作..... 谈凤梁(231)

试论《儒林外史》对封建道德的暴露与批判

..... 陈美林(258)

《吴敬梓研究》出版..... 仁(257)

·金圣叹研究·

从《春感八首》看金圣叹的晚年思想..... 钟来因(278)

·《水浒》续书研究·

- 陈忱《水浒后传》杂议 萧相恺(293)
略论《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 陈周昌(312)

·清末小说研究·

- 《海上花列传》与其以前的小说 章培恒(325)
编后记 (335)
南京图书馆藏戚蓼生序抄本《石头记》 (封二)
吴承恩胸像的科学复原 (封三)
稿约 (封四)

• “开创明清小说研究新局面”笔谈 •

明清小说研究途径的随想

何满子

在现代文学的概念中，小说是最重要的体裁。小说又是计算文学成绩的决定性的一块砝码。研究古代的文学现象，要把小说当作主要的课题，多花些气力，梳理出它的发展脉络，阐明它内容和形式的内部规律，以及它和诗歌、戏剧等姊妹文体乃至历史生活的相互关系，其必要性和迫切性是十分显然的。文学遗产的古为今用，大概没有比从研究小说入手更为直接收效的了。

具有近代小说规模的短篇小说，在我国文学史上，是从唐人传奇开始的。但长篇小说却要到明代才完成了从宣讲（诉之于听觉的）到文学本（诉之于阅读的）的过渡。除了简率、粗糙、仅具梗概的，大抵是说话艺人的脚本的文本以外，现今流传的典范性古代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都是明人写定的。脱离了宋元人传统说话艺术的依傍而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如《金瓶梅》以及继起的大批才子佳人小说，也出现于明代。短篇小说方面，宋元话本的结集和润色，大量拟话本的创作，也和长篇小说的繁荣同步发展。与小说创作的繁荣相应，明代经济、文化集中的几个都市，如苏州、

南京、建阳等地，出现了专以创作、编辑、出版小说为主而营生的独立的社会阶层。所有这些，都为前代所未有，即或有之，也只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尚未蔚为风气。迄至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以前，没有一个朝代，小说事业的兴旺能赶得上明代的。明代诚然是中国小说的成熟期和黄金时代。

小说既是从说话艺术的基础上孕育和成长起来的，因此当它在明代完成了由讲演到阅读的转化过程后，不论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免带有母体的胎记。就连《金瓶梅》那样的没有传统的民间艺人创作渊源的独立创作，单就它的词话体说来，也还脱不尽传统说话艺术的痕迹。文学的发展，艺术的创新，需要一个艰难的过程，正如一个人的诞生、成长，脱离父母而取得独立的人格需要一个过程一样。继《金瓶梅》之后并步武于《金瓶梅》的明末清初的一批才子佳人小说，它们出世的时期，在小说史上虽是一个停滞时期或低潮时期，但承担了一个在稚弱中逐渐成长的任务；越过这些不甚耀眼的阶梯，《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那样的几乎是现代型的小说在十八世纪出世了，登上了五四以前的中国小说的顶峰。不但在小说这一体裁说是顶峰，从其表现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来说，在整个古代文学现象中也是顶峰。

研究小说艺术的这一段历史现象，不仅同当今的文学实践关系最为密切，而且从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可以照亮其他体裁的古代文学现象的纵横侧面。深入仔细地考察一下，都可以发现在明清小说中潜藏着连接各种体裁的古代文学的沟渠，只是以往的研究工作对此还没有给以充分的注意。别的文体，有的不能统摄小说；而小说却可以统摄几乎所有文体

的作品，甚至连八股文这样与艺术文学风马牛不相及的文体，也有单向渠道通向小说——所谓单向渠道，就是说，小说并不向八股文回流，受其影响而不施予影响。这里不说小说以反映生活的角度也反映了八股文和科举制度的现实，单就和明清小说密不可分的评点派的小说评论而言，便非追究到八股章法和八股习气不可。

明清小说既是宋元说话艺术的血缘继承者，又兼祧着唐和唐以前文人小说的传统，短篇小说尤其如此。明代和清初文人的拟话本，汲取前人的故事为题材的占很大的比数。问题在于不单是汲取题材，袭用情节，更在于艺术方法的传承关系上。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不应满足于考索出每篇小说、每个情节来源于前人的某篇某书；重要的是在探索出处之外，研究彼此艺术方法的异同，演进的轨迹以及不同时代生活与美学上的各种关系。这样，研究工作才不致于逗留在考据材料的基础知识的范围之内。当然，这样的研究如果不占有材料是无法措手的。

研究文学现象也和研究别的社会现象一样，要从左邻右舍的关系中进行析理。特别是明清小说，它的前身是说话艺术，而说话艺术在宋元时是在瓦肆即游艺场中发展起来的，因而它和同出于游艺场所的姊妹艺术戏剧的因缘极为密切。明代较早的几种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尤其如此，这几种小说和“三国戏”、“水浒戏”、“西游戏”之间交互影响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至今还很难理清；以至从文学史的角度，从发展的流脉来研究，小说和戏剧，简直很不易截然分割。这种情况作为历史因素还延续到后代。一个重要的

现象极耐寻思：在吴敬梓和曹雪芹的大著问世以前，清代早期的小说创作是极为沉寂的，除李渔的几种短篇小说之外，几乎没有作品可纪。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尚无确说，但它的风格是晚明的，而且它的分量也不足以承《金瓶梅》至《红楼梦》之间之乏。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整整一个世纪，除了文言短篇小说《聊斋志异》外，小说领域几乎是一片空白；而蒲松龄的著作，和由说话艺术演化而成明清白话小说，无论从流脉和文体来说都是两途。在这之间，填补大众艺术空白的是两大剧作：《桃花扇》和《长生殿》。两种都从民间艺术出身的文体，由于它们血缘的亲近，毕竟最容易互相替代着传出人民的心声。这一历史现象中所包含的中国古代小说和戏剧间的微妙关系，不论从文学史的角度或文学体裁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来说，都是值得探索和发掘的。

上面提到了八股文，八股文以及作为它的思想基础的程朱理学，是明清两朝统治阶级钳制知识分子和全社会精神意识的主要手段。文学作为社会意识中最活跃的因素，在反对统治阶级的思想钳制，争取人民的自由意志的斗争中，其总的的趋势都是和八股文理学对抗的。不单是群众艺术的小说，即连诗文等正统文学，就总的思潮说来，也是小说的或亲或疏的同盟军。明代的正统文坛很长一段时期是由“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拟古思潮和规模韩、柳、欧、苏的唐宋派控制的，表面看似乎很令人泄气，但复古、拟古的骨子里，其实正是对于八股时文的厌倦和抵制，这和清人的治经、作考据工夫一样，是对程朱理学的别一形式的反抗。这种反抗八股

和理学的潜流，至明代中叶的李贽、袁宏道等人而表面化，因此这些人都是鼓吹小说的。正统文学和俗文学在反八股、反理学的目标下，无意识地或半意识地合了流。但是，八股和理学的势力也向小说发动反攻。这里不是说官府对小说的禁止和格杀，而是指的意识战线上的内部斗争。这种交锋在小说的创作和理论批评上无处不有。不少小说如明末清初的才子佳人小说中，就不乏为科举制度张目，以八股和理学的精神来侵染读者的。小说评论中以金圣叹为主要代表的评点派，也诚如鲁迅在《谈金圣叹》一文中所说的：“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这一八股与反八股、理学统治与反理学统治的斗争，既是明清文化思想阵线斗争的主线，也就更其是小说体现其社会任务的重点。从社会思想斗争的线索，研究小说在这一斗争中的内部和外部的现象及其关系，当大有助于对明清小说发展及其实质的把握。

小说是通俗艺术，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拥有较任何文体的作品更广泛得多的群众影响，很少有具备阅读能力的人而不受小说的影响的。它是民族意识的重要陶冶者，又担当着群众的美学教程的任务。今天广大群众审美学的心理结构中，明清小说的影响仍不可忽视。要谈到艺术的民族化，无论从理论的建立或实践上的运用，都必须把明清小说的美学内容的研究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这点恐怕是很少人会否认的了。在这个问题上，对某一作家和作品的研究固然重要，但对整个小说艺术的全面、深入、多层次和系统化的研究，似乎更为重要，更应引起明清小说研究者的关注。

从《明清小说研究》所想起的……

吴调公

有一个较长时期，我不再研究古代小说了，主要精力已经转移到中国古代美学和古代诗歌研究方面。不过，我也还经常读一些当代小说和考虑一些小说的艺术规律问题。我总有这么一个感觉：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固然可以通过一切文体来表现，但表现得更为具体，更为自如，更为完整，更为细节化，或者说，让“心灵史”和“风俗画”两者更好地结合起来，在这一点上（也许仅仅是在这一点上），小说也许更占有优势吧。十九世纪波兰现实主义作家奥洛什科娃谈到小说特点时，曾写下这么几句精辟的论析：

我们可以把小说比做一种魔镜，反映出事物的外貌及它为众人所看到的日常秩序，同样也能表现出事物的最深邃的内容，它们的类别和五光十色，以及它们之中所进行的相斥相引，它们产生的原因及存在的后果……

小说本来就具有“五光十色”的“魔镜”性质。五光十色的社会是形成小说题材丰富的主要基础。

虽说早在青年时代因为写过小说而热爱小说理论，但总不如后来因为从文学史上比较清晰地看到从“说话”的“话本”发展而为长短篇古代白话小说之洪波迭起，更引起我为文学

遗产中有这样的瑰宝而自豪。而今天，我则又为江苏省创办了有关明清小说研究的专门化刊物而兴奋，而沉思：这一宗古代瑰宝将如何更好地成为“今用”。我不仅为此而欢欣鼓舞，更为青年时代在艺术宝藏方面揣摩得极其不够而感到遗憾。我没有象奥洛什科娃那样，把小说的“相斥相引”提到古代作家对人物关系卓越处理的艺术高度，我没有把标志着技巧成熟时期的明清小说的艺术特色结合美学范畴去进行研究，我更没有把明清社会的现实美和明清小说中具有民主性精华的艺术美结合起来加以考察。

但现在，这些遗憾都可以望其逐步得到弥补了。通过群策群力的切磋，过去这一段多少有些显得美中不足的文学遗产研究的薄弱环节，一定可以获得充实。

怎样充实？我想谈三点肤浅看法，向同志们请教。

首先，作为明清小说研究的指导思想，是否可以采取宏观精神，抓住反映封建社会走向下坡这一个时代特点，注意一下“魔镜”中的狂猖人物。一般说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时代，作为叛逆者出现的小说家比较罕见。他们往往是采取讽喻形式而实则补天。及至末世来临，即使小说家仍不免于有某些补天思想，而不可能与其本阶级决裂；然而与此同时，他们中的一些前驱者，往往在不同程度上表现为各式各样的叛逆者了。继《三国演义》的《隋唐演义》的作者，主张创作历史小说应该“有关风化”，“为正史之补”。说明十六世纪利用小说来“补天”的思想仍较普遍。这属于前一种。随着晚明启蒙思想曙光的喷薄而出，哲学上鼓荡起追求个性解放的狂飙，诗文上涌现了抒发“性灵”和“生气”的怒潮。现实中出

现了“亦狂亦侠”的文人的啸傲生风，小说作品中则更闪耀着叛逆人物或人物中叛逆因素的奇光异彩。杜大先生夫妇之游清凉山，已经是惊世骇俗，贾宝玉之“似傻如狂”就更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小说中的“狂人”形象和诗文中脱略形骸的意境，两者可以说同是封建末世“下坡路”中隐藏在正面人物中思想倾向的桴鼓相应。它们都是突破长期封建统治的进步主流。

不管是研究小说作者，或是研究作品中的人物，我们要真正认识明清小说的“魔镜”的“深邃内容”，如果不运用宏观认识，不把这些“魔镜”放在一定历史潮流中观察，我们是不可能洞彻那些投射在小说作品中的时代折光的。如果说我们过去对明清小说以至对小说的研究，没有充分注意它们的历史土壤，如作者的创作动机，人物的思想倾向，艺术形式的承传和发展的客观条件，等等，那当然是言过其实。然而，我总依稀仿佛地感觉到，过去对历史背景的研究，不一定完全能和作家、作品本身所体现的社会思潮的研究水乳交融，在作家的历史土壤和作品的时代烙印两相扣合上，注意的程度和处理的方式似乎略有不足。分体的探索较多（这些都是必要的），总体的掌握较少。人物的时代特色未始没有阐述，但透过人物思想深处的东西，或者说针对他们最最关心注意的东西，如何去由小见大地掘发出封建下坡时代人们的灵魂深处，特别是足以扣合作者灵魂，规范着作者审美观点的社会思潮加以阐述，这就显得比较忽略了。

见树见林。从一滴水可以看出浩淼的海洋。贾宝玉这一个叛逆者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就以现实的狂人而论，在曹雪

芹前，有徐渭，有张岱；在以后，有龚自珍笔下的吴之癯。把贾宝玉的摇篮放在明代启蒙思潮之萌芽、发展以至于地主阶级革新派初步产生这一条绵长的思想脉络之间，作为封建下坡路过程中小说的进步主流之一——叛逆性，就不难索解，而明清小说的民主性精华也就不难掌握。当然，我们不需要把这一股思潮写成游离于作家、作品具体分析之外的哲学讲义，但我们研究的指导思想，似乎不能离开这一根弦。刘世德同志在论及《三国志演义》研究时，曾经特别强调“眼界要开阔些”（见1984年4月3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这确是高瞻远瞩的见解。虽说他的具体建议不和我尽同，但我认为彼此精神可以沟通，研究道路是相辅相成的。

其次，明清小说的艺术规律有待于广泛深刻地提炼，而美学大可作为武器。由于市民经济逐渐繁荣，社会生活更为丰富多彩，从而为具有市民意识的人们提供了绚烂多姿的审美对象。遍及现实生活中所有实践领域，生产斗争，政治生活，道德，科学等等实践，都可以渗透着或导致人们的审美活动，提供审美对象。因此，城市繁荣不仅带来小说题材的多样化，更带来“世情”的复杂化，从而有利于侧重“风俗画”描写和人物关系的曲折微妙的反映。明清两代，倡导小说要淋漓尽致地写好“世情”的人太多了。正因为张竹坡和脂砚斋是最懂得揣摩小说“世情”的评论家，所以他们能从鉴赏中发现一些精彩的艺术规律。

今天，明清小说之于我们，研究的有利条件太多了。且不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助于科学的宏观与微观，作为研究对象的明清小说本身的艺术成就，较之六朝志怪、唐代传

奇以至宋元话本，其题材之宏富，白话型文字之愈臻纯粹、成熟，表现技法之争妍斗胜，以至篇幅、容量之短长俱备，都可以说是较之过去有了长足发展。一反常态，竟然能与一直高踞正统地位的古诗文相抗礼，甚至占压倒的优势。

为了更好地进行研究，对于古代作家、作品的艺术特色，应该有深切的、全面的、本质的认识，因此，结合美学观点加以总结是很必要的。在这里，我可以谈一点自己的切身感受，即有关《红楼梦》中晴雯之死的艺术处理问题。姑举一例。将近八十回时，晴雯确是死了。小说开头早已点明，她的“彩云易散”。但其实，又何尝真的魂断香消呢？你看，小说不是给她安排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吗？玉皇敕命其司主花神，而且是专管芙蓉花的神。芙蓉花是清初叶燮在《原诗》中所说的“秋花”，淡雅，清秀，凄冷，特别是高洁。曹雪芹本是一个最讨厌“混信神，混盖庙”的人，然而他偏要派她做一个神。这是一个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细节，是一个为始终野性未驯的女奴永葆其英灵之气所安排的美妙归宿，也更是作者寄托于幻想中自认为合情合理地存在着的幸福的种子。如果我们不深切地体验“花神”的美学内涵，我们就可能把曹雪芹尽情赞美的神同他一向反对的愚夫愚妇烧香拜佛时所供奉的神相混，当然，也就不可能正确认识为作者所精心虚构的崇高人物的美丽象征手法有着以泛神论为基础的美学理想。

明清小说研究中似乎还有一件工作需要我们进一步开展，那就是古代评点家的小说理论有待于掘发、整理、研究、开拓。评点，在古代文学史上，本不限于小说。但小说评点